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  
文献整理与研究 (下)

孫繼民 等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K206.3  
20121  
3

阅 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 文献整理与研究 (下)

孫繼民 宋 坤 陳瑞青 等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孙继民等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303-14048-0

I. ①俄… II. ①孙… III. ①边疆地区—文书档案—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8178 号

---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E CANG HEI SHUI CHENG HAN WEN FEI FO JIAO WEN XIAN ZHENG LI YU YAN JI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40 mm  
印张: 77.5  
插页: 7  
字数: 135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0.00 元 (上、中、下)

---

策划编辑: 刘东明	责任编辑: 刘东明 柳 宪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肖 辉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 研究編



## 綜合研究

###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的朝代構成新見

——兼論黑水城文獻研究的學科定名問題

孫繼民

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於1907年至1909年，兩次到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黑水城遺址進行挖掘，發現了大批歷史文物並運往俄羅斯。這批文物分為器物和文獻兩類，器物部分收藏在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文獻部分現存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黑水城文獻入藏俄國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除了前蘇聯學者進行過一些整理研究，出版有《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錄》等書之外，中國學者罕有目睹。20世紀90年代，在中俄兩國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下，這些文獻終於結集為《俄藏黑水城文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目前已出版十多冊，計畫全部出齊約計三十冊。《俄藏黑水城文獻》由漢文部分、西夏文世俗部分和西夏文佛教部分三部分構成。隨着《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學術界有關俄藏黑水城文獻的介紹和研究正逐漸增多，人們的相關認識也日趨豐富，可以預期，這一趨勢在能夠預見的將來仍將持續下去。但是，畢竟由於《俄藏黑水城文獻》出版時日尚短，廣泛深入的研究也絕非一蹴而就，因此在現有的黑水城文獻的知識體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例如黑水城文獻的學科定名），這就需要我們予以澄清，以利於推動俄藏黑水城文獻以至整個黑水城文獻學術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有鑒於此，本文擬對有關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朝代構成問題和黑水城文獻研究的學科定名問題闡述一下自己並不十分成熟的見解，不妥之處殷望方家指正。

—

對黑水城漢文文獻的朝代構成，迄今並無專文研究，一般來說學者們

只是在涉及有關論述時才順便提及，如《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冊所收史金波先生所撰《前言》就說“俄藏黑水城文獻有八千多個編號，係中國中古宋、夏、金、元時期的寫本和刻本，其中絕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獻”，同書李偉國先生所撰《前言》也說“黑水城文獻的發現，則展示了遼宋夏金元特別是西夏時期的文化資源，其數量之多，內容之廣，品質之高，均差可同敦煌文獻媲美，和敦煌文獻相似”。史先生列舉文獻形成的朝代是“宋、夏、金、元”，李先生列舉的朝代則是“遼宋夏金元”，考慮到《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冊出版於1996年，只是漢文文獻的第一冊，史、李兩先生限於當時條件無法綜合全部漢文文獻的情況因而出現上述的差異，這不僅不足為怪也完全不可避免。至2000年底《俄藏黑水城文獻》第6冊出版，俄藏中的漢文文獻至此全部出齊，這就為全面考察漢文文獻的朝代構成提供了基礎和可能，而該書後附的由孟列夫、蔣維崧、白濱撰著的《敘錄》就責無旁貸地承擔起了這一職責。《敘錄》實際上是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的内容提要，包括文獻的朝代、文獻性質（刻本或寫本）、頁碼數量、行款裝潢、墨色題記、內容簡介，甚至錄文和考證等等，非常便於檢索以供研究。從《敘錄》的著錄情況看，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朝代構成就時序而言有唐、五代、宋、西夏、偽齊、金和元代（包括北元），其中以西夏數量最多，其次是宋代，再次是元代，又次是金代，最少的是唐代、五代和偽齊文獻，各只有幾件。

以上就是筆者目前所知有關俄藏黑水城文獻朝代構成的幾種主要見解，也可以說是學術界有關這一問題的代表性看法。對於這些看法，筆者認為至少應該補充或強調如下幾點意見。第一，《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中包括少量的遼代文獻。《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中是否有遼代文獻？如上所述，學者們起初意見並不一致，李偉國先生認為有（遺憾的是沒有指出具體文獻所在），史金波先生沒有提到，《俄藏黑水城文獻·敘錄》也沒有確認。不過，《敘錄》在著錄第4冊第52頁至57頁的TK166號《孫真人千金方》時提到，中國中醫研究院的馬繼興認為此件是遼刻本。《敘錄》儘管沒有採納馬繼興的意見而最終確認是金刻本，但說明學者們已經注意到了其中包括遼代文獻的可能性問題。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6冊出版數年之後，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包括遼代文獻幾乎同時得到了中外學者的確

認。2003年，日本學者竺沙雅章《黑水城出土の遼刊本について》一文指出，《俄藏黑水城文獻》第6冊第69頁刊發的兩件佛經刻本殘葉是混入俄藏敦煌文獻的黑水城文獻，<sup>①</sup>認為是遼代刻本《契丹藏》的殘片。<sup>②</sup>同年，中國學者金滢坤《〈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城文書考證及相關問題的討論》一文也指出，《俄藏敦煌文獻》第16、第17兩冊誤收入的黑水城文書達17件，其中一件《遼聖宗統和二年(984)牒及判》就是遼代文書。<sup>③</sup>由此可見，俄藏黑水城文獻之中確實存在遼代文獻，相信以後仍然存在通過甄別獲得新發現的可能，而不止以上三件。<sup>④</sup>《俄藏黑水城文獻》無疑包括遼代文獻。

第二，《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還夾雜有一件清代文獻。《俄藏黑水城文獻》第5冊第14頁刊有俄藏編號為TK319的《官員加級錄》，第6冊後附的《敘錄》稱此件：“宋刻本。白麻紙，細，薄。高26，寬15。版框高20.3，寬13.9。共9行，行12—14字。四周雙邊，中烏絲欄。宋體，墨色深勻。有穿孔裝訂痕跡。後附同樣大小潢麻紙，亦有穿孔，或許是封底。有官員加級紀錄、次數、人名。一說從四角框線拼接，木板無裂紋等特點看，或為活字印刷品。”此件是否活字印刷品可以不論，但是否一定是《敘錄》所說的宋刻本則未必。為了便於說明，今將文書內容謄錄如下：

1. 五官正加五級，紀錄十三次，恒德。
2. 春官正加七級，紀錄五次，王嵩齡。
3. 夏官正加三級，紀錄六次，何元瀛。
4. 中官正加六級，紀錄八次，陳恕。
5. 秋官正加十級，紀錄五次，賈德輔。

① 一是俄藏編號 φ123A《增壹阿含經利養品第十三》，一是俄藏編號 φ204A《增壹阿含經結林品第四十六》。這兩件文獻原被《敘錄》確定為西夏刻本。

② [日] 竺沙雅章：《黑水城出土の遼刊本について》，《汲古》第43號，2003年，第20頁。

③ 金滢坤：《〈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城文書考證及相關問題的討論》，《敦煌學》第24輯，2003年，第62—63頁。

④ 據謝玉傑《英藏黑水城文獻·序言》介紹，英藏黑水城文獻也有遼代文書。《英藏黑水城文獻》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6. 冬官正加二級，紀錄二次，姚延之。
7. 主簿加三級，紀錄五次，常興。
8. 主簿加三級，紀錄七次，方德裕。
9. 五官司書加三級，紀錄八次，何元滋。

《敘錄》將此件定為宋刻本的依據是什麼，我們不清楚，大概是鑒於唐代尚未有雕版經史，而文獻下限又不及明朝，內容既非夏金，亦非元朝，因而推斷為宋吧。實際上，此件不可能為宋代印刷品，這可以從文獻內容涉及的制度分析推知。如《敘錄》所述，此件內容是分列恒德、王嵩齡等9人的官職、加級和紀錄，亦即涉及了職官制度的官名和官員的加級、紀錄制度等。按，五官正、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等官職，自宋代直至清代都有設置，僅僅憑這些官名無從判斷此件的年代。而加級和紀錄制度則不然，在宋元明清前後變化很大。例如紀錄制度，筆者曾檢索電子本《四庫全書》，得知《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上》右補闕盧備上疏有“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勸戎行”等語，《宋史》、《元史》和《明史》等書，也多有類似的用語，可知唐至明代這些“紀錄”除了表示官員的功過記錄或與考核制度有關之外，再未見到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但至清代，加級和紀錄成為官員敘遷的重要制度，有關規定非常細密，例如，《清會典》卷一一《吏部》載：“凡議敘之法二：一曰紀錄，其等三（計以次，有紀錄一次、紀錄二次、紀錄三次之別）；二曰加級，其等三（計以級，有加一級、加二級、加三級之別）；合之，其等十有二。”所以，清代文獻常見某某官員加若干級、紀錄若干次記載，如《四庫全書》的《御制日講禮記解義序》就後附有現任副總裁官汪由敦的官銜和加級、紀錄，稱“經筵講官、太子少師、刑部尚書、加二級、紀錄一次”。顯而易見，繁密詳瞻的加級和紀錄制度是清代官制的内容而非宋代制度，《官員加級錄》應是清代文獻而非宋代刻本。<sup>①</sup>《俄藏黑水城文獻》至

<sup>①</sup> 筆者曾就宋代有否加級、紀錄制度請教過宋代職官制度研究專家苗書梅女士，苗女士也稱未曾見到有關資料。謹此向苗女士致以謝意。

少有一件清代文獻。<sup>①</sup>

第三，《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的朝代構成還應包括偽齊劉豫政權的三件文書。如前所述，《敘錄》已確認《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中有偽齊寫本文書，但奇怪的是學者們在介紹文書情況時往往忽略偽齊文書，所以應該特別強調一下。偽齊寫本文書總共有三件文書，均收錄於第6冊，依頁碼順序分別是在第248頁、第286頁和第301頁。第248頁屬於俄藏編號 ИИВ. No. 211 213 被編者定名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的一組文書，是這組文書的第85頁，被《敘錄》定名為《阜昌二年八月十五日第七將牒》。該件文書的前6行內容如下：

(前缺)

1. 監押
2. 遠即轉牒州縣，遞送前去，無致依
3. 前違戾。所有副將，亦仰一面關報。
4. 仍具知稟供申。准此。
5. 第七將
6. 阜昌二年八月十五日

第286頁俄藏編號為 ИИВ. No. 709，被編者定名為《阜昌三年(1132)秦鳳路第柒將請發遣狀》，係由西夏文刻本蝴蝶裝《維摩詰所說經》封套裱紙拆出。該件文書內容如下：

(前缺)

1. 安撫 使衙三月十八日牒：請速將前件
2. 張立、孟元，火藥匠張二奇、陳大立便發遣
3. 當司出頭。須至申
4. 聞者。

<sup>①</sup> 可以確認的清代文獻僅此一件。考慮到整個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形成年代均在北元以前，因此此件不排除是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混入品的可能。

5. 右充依准
6. 指揮，已即時將砲手張立、孟元，火藥匠張[ ]
7. 陳福等四人隨狀發遣赴
8. 行衙出頭去訖。謹具申
9. □啓 安撫 路分[ ]
10. 照會收管施行。謹狀。
11. 阜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武翼郎秦鳳路第柒將權會州馮 [ ]
12. 會州馮武翼申
13. [張立]等四人事 二十三日

第 301 頁俄藏編號為 ИИВ. No. 2559，被編者定名為《阜昌三年(1132)本路第七將呈狀》，也是由西夏文刻本蝴蝶裝《維摩詰所說經》封套裱紙拆出。該件殘存 5 行內容如下：

(前缺)

1. 照會收管施行。謹狀。
2. (朱印)阜昌三年三月十八日迪功郎會州司法參軍[ ]
3. 修職郎會州司理參軍□[ ]
4. 武翼郎本路第七將權[ ]
5. 敦武郎 閤門祇候本路兵馬都監[ ]

(後缺)

從以上引文可見，第 248 頁第 5 行為“阜昌二年八月十五日”，第 286 頁第 11 行殘存有“阜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武翼郎秦鳳路第柒將權會州馮”等字，第 301 頁第 2 行殘存有“阜昌三年三月十八日迪功郎會州司法參軍”等字，三件文書均綴有“阜昌”字樣。我們知道，阜昌是偽齊劉豫政權的年號，這三件文書毫無疑問屬於偽齊劉豫政權的文書。劉豫政權是兩宋之際繼張邦昌偽楚之後由金人扶植的又一個傀儡政權，存續時間極短，首尾不過八年。儘管偽齊文書在《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中可以確認的僅此三件，但畢竟聊勝於無，理所當然應列入《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

的朝代構成之中，更何況偽齊劉豫政權的文書迄無存世者，其資料價值不言而喻。<sup>①</sup>

第四，《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還包括幾件唐代和五代文獻，這一點常常為人們所忽略。據《敘錄》，編者確認的唐代文獻有：TK157《妙法蓮華經信解品第四》（第3冊第384頁）、TK188《妙法蓮華經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第4冊第190頁）、TK317《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卅八題簽》（第5冊第13頁）、TK325《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第5冊第89頁）、B54《妙法蓮華經卷第三》（第6冊第17頁）、B55《妙法蓮華經卷第三》（第6冊第18頁）、B56《妙法蓮華經卷第五》（第6冊第28頁）、B57A《華嚴三聖版畫》（第6冊第41頁）、ИHB. No. 5949《建中六年書信》（第6冊第319頁）；編者確認的五代文獻有：TK283《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像供養文》（第4冊第372頁）、TK288《四十八願阿彌陀佛供養文》（第4冊第377頁）、TK289《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像供養文》（第4冊第378頁）、Φ221Φ228Φ26《大乘入藏錄卷上》（第6冊第72頁）。《敘錄》編者已經指出，以上唐代文獻中的TK188、TK325、B54、B55、B56諸號和五代文獻中的TK283、TK288、TK289諸號均為混入的敦煌文書，那麼很顯然，TK157、TK317、B57A、ИHB. No. 5949諸號唐代文獻和Φ221Φ228Φ26五代文獻則是黑水城所出。總之，唐代和五代文獻也是《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的朝代構成之一，儘管其數量甚少。

綜上所述，目前所見的《俄藏黑水城文獻》6冊漢文部分除了人們所熟知的大量夏、宋、金、元（包括北元）文獻之外，還有數量不等的唐代、五代、遼代和偽齊文書，並有一件清代文書。如果說其中的清代文獻很可能是混入品只能作為一個例外的話，那麼我們不妨這樣說，《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以至整個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朝代構成就是唐、五代、遼、宋、夏、金、偽齊、元（包括北元）諸朝。這就是本節得出的基本結論。

<sup>①</sup> 筆者已利用後兩件文書所出現的有關火藥的資料，撰成《火器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新刊偽齊阜昌三年(1132)文書解讀》一文，已刊於《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344頁。在“黑水城漢文文獻與宋夏金元史”學術研討會上，馮金忠則利用這兩件文書提交了《新刊黑水城阜昌三年文書所見偽齊職官制度》一文，已刊於《文獻》2010年第1期，第143—150頁。

## 二

明確《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的朝代構成有助於探討黑水城文獻的學科定名問題。筆者在2004年發表的《黑水城宋代文書所見蔭補擬官程式》一文曾經指出，20世紀初敦煌文書的發現不僅催生了一門新興的學科——敦煌學，而且還深刻地改變了唐史研究；比敦煌藏經洞發現稍晚的黑水城文獻的發現也同樣催生了一門新興的學科——西夏學，可以預期隨着《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必將推動這一學科的發展壯大，但它對宋史研究的影響遠遜於敦煌文書對唐史學界的影響；黑水城文獻對宋史研究的影響弱於敦煌文書對唐史的原因固然是由於過去黑水城文獻的主體皮藏異域秘不示人而新出《俄藏黑水城文獻》書價昂貴普通學人難以購閱，也與一般研究者將黑水城文獻簡單理解為西夏文、西夏歷史文化內容為主而忽略其中漢文和非西夏資料的認識誤區不無關聯。<sup>①</sup>當時，筆者剛剛涉足俄藏黑水城文獻研究，儘管對其中漢文資料的整體情況缺乏系統了解而認識也不免膚淺，然而強烈地感覺到長期以來將黑水城文獻簡單定性為“西夏學”，在相當程度上影響或限制了非西夏學學者對黑水城文獻研究的關注和參與。現在，《俄藏黑水城文獻》已經出版了十多冊，漢文部分（前六冊）全部出齊，距第一冊出版的時間也有了十多年的時間，可是目前的研究狀況與原來有些學者的預期仍然有着相當的距離。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固然是有多種，例如《俄藏黑水城文獻》雖然稱得上是大宗文獻，然而文獻總量與敦煌文書（包括吐魯番文書）相比仍然偏少；黑水城文獻的大多數是西夏文，漢文文獻比例太低；與敦煌文書（包括吐魯番文書）對應的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傳世史籍整體資料缺乏，學術界對新出資料的渴求度比較高，與黑水城文獻對應的宋夏金元時期傳世史籍整體資料豐富，學術界對新出資料的渴求度比較低；等等，但是一個基本的原因恐怕仍然是與一般研究者將黑水城文獻簡單理解為西夏文、西夏歷史文化內容的認識誤區有關。因此，筆者認為探討俄藏黑水城文獻研究的學科定名有必要首先弄清

<sup>①</sup> 孫繼民：《黑水城宋代文書所見蔭補擬官程式》，《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74頁。

“西夏學”的內涵、辨明黑水城文獻與西夏學的關係，澄清籠罩在二者關係之間的重重迷霧，以利於推動黑水城文獻的學術研究和發展。

所謂“西夏學”，根據目前學者們通行的用法，至少包括兩層含義：第一，圍繞西夏文文獻研究而形成的專門學問；第二，圍繞西夏王朝研究而形成的專門學問。按照第一種含義，“西夏學”是圍繞西夏文而形成、研究對象為單一文種的學問，凡是使用西夏文的文獻和以西夏文文獻為研究對象以及與此相關的論題，均應屬於西夏學的範疇。按照第二種含義，“西夏學”是圍繞西夏王朝一代、研究對象為西夏單一王朝而文字不限於西夏文的學問，因為西夏王朝使用的文字還包括漢文、藏文以及其他文字等多種文字，凡是以西夏王朝為研究對象包括以西夏王朝各種文字文獻為對象以及與此相關的論題，均應屬於西夏學的範疇。要而言之，如果一分為二，西夏學或是指圍繞西夏文文獻研究而形成的單一文種的專門學問，或是指圍繞西夏王朝研究而形成的單一王朝的專門學問；如果合二而一，西夏學則是指圍繞西夏文和西夏王朝研究而形成的專門學問。無論如何，“西夏學”與“西夏文”和“西夏王朝”緊密相連，不可割裂。

儘管筆者不同意以“西夏學”指稱或概稱圍繞黑水城文獻研究而形成的專門學問，但“西夏學”一稱的出現、使用與流行卻有其科學性與合理性的一面，這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西夏學”一語反映了黑水城出土文獻以西夏文為主的實際構成。如俄藏黑水城文獻 8000 多個編號，其中西夏文獻的編號占了 90% 以上，實際文獻量也不低於 80%。這一點，學者共知，無須贅舉。第二，“西夏學”一語留下了近代以來國內學術界最初對黑水城文獻關注點與興奮點的痕跡。如所周知，黑水城文獻首先由科茲洛夫發現而入藏俄羅斯，接踵而至的斯坦因續有收穫而入藏英國，因而最早對這些文獻進行整理研究的自然非國外學者莫屬。國內學術界最早全面介紹黑水城文獻發現和內容的是 1932 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四卷三號《西夏文專號》，該刊雖以《西夏文專號》為名，其實也包含相當數量的漢文文獻，據史金波先生統計，介紹的漢文文獻共有 26 種。明知包含漢文卻仍稱《西夏文專號》，可見中國學術界對西夏文文獻的關注與興奮。第三，“西夏學”一語凸顯了黑水城文獻研究的學術特色。黑水城文獻的主體是西夏文，而西夏文又是已經消失的死文字，並且歷史上西夏王朝的文獻

極其稀缺，這一切都足以構成黑水城文獻研究誘人的學術魅力，也恰好體現了它不同於以漢文為主要記載形式並且是活文字的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的學術特色。正是由於以上三個原因，“西夏學”的稱謂一經使用，很快風靡學界，以“西夏”冠名的學術會議、研究機構、文化單位、書籍名稱層出不窮，大有覆蓋“黑水城文獻研究”稱謂之勢，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西夏學”概念所具科學性的“合理內核”。

但是，我們在看到“西夏學”固有的科學性合理性一面的同時，也必須實事求是地認識到這一稱謂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和狹隘性。其局限性和狹隘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西夏學”一語所體現的單一文字含義不足以涵蓋黑水城文獻所包括的多語種的文字構成。據史金波《俄藏黑水城文獻·前言》，俄藏黑水城文獻8000多個編號包括的語言文字種類有西夏文、漢文、藏文、蒙古文、回鶻文等多種民族文字，其中西夏文文獻數量最多，約占90%左右；漢文文獻次之，不足10%；其他民族文字資料數量較少。據謝玉傑《英藏黑水城文獻·序言》，4000多件文書中除了西夏文和漢文外，“還有為數可觀的藏文、回鶻體蒙文等”；據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逸友等編《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介紹，1983年和1984年在黑水城發掘所得文書涉及的文字種類計有漢文、“西夏文、畏兀兒體蒙古文、八思巴字、藏文、亦思替非字、古阿拉伯文等等各種民族文字文書”。由此可見，儘管黑水城文獻三大部分相加之後的主體文獻是西夏文，但其中全都包括有漢文以及其他多種民族文字，絕非“西夏文”所能涵蓋。

第二，“西夏學”一語所體現的單一王朝含義不足以涵蓋黑水城文獻所包括的多王朝的朝代構成。正如筆者上面所述，《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所反映的朝代構成是唐、五代、遼、宋、夏、金、偽齊、元(包括北元)諸朝(甚至混入有清代文獻)，這也同樣可以代表整個黑水城文獻的情況。這種綜合的朝代文獻構成顯然非“西夏王朝”單一朝代的含義所能涵蓋。

第三，“西夏學”一語所體現的清一色西夏文和西夏王朝文獻的含義均不符合黑水城文獻非西夏文、非西夏王朝文獻佔有相當比例的事實。俄藏黑水城文獻一般說有8000多個編號，其具體數量據白濱先生介紹，1963

年由戈爾芭切娃和克恰諾夫編定的《蘇聯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藏西夏文寫本和刊本考定書目》收錄的文獻編號是 8090 號，其中漢文文獻的數量據 1984 年孟列夫編輯的《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錄》收錄的是 488 件，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合作整理、編輯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六冊收錄的文獻有 636 個編號。就編號而言，漢文文書只占全部編號的 0.79%，但是實際數量遠遠超過這個比例。據出版計畫介紹，《俄藏黑水城文獻》擬出 30 冊，而已出的漢文部分即已有 6 冊，占全部計畫冊數的 20%。漢文文獻僅次於西夏文。非西夏王朝的文獻占整個黑水城文獻的比例，目前沒有確切的統計資料，但據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介紹，1983 年和 1984 年兩次在黑水城發掘所得的文書近 3000 件，其中漢文文書計有 2200 餘件，全部是元代(包括北元)文書。在黑水城三大文獻構成中，這是唯一的以漢文和元代文書為主的黑水城文獻。儘管這無法改變黑水城文獻中西夏文獻為主的比例構成，但嘗鼎一臠餘味可知，足以說明“西夏學”一語無法涵蓋整個黑水城文獻的性質。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基本認識，目前流行的“西夏學”一語不足以涵蓋黑水城文獻研究的性質，“西夏學”不等於黑水城文獻學，圍繞黑水城文獻研究而興起的專門學問不宜用“西夏學”來指稱或代稱。

那麼，圍繞黑水城文獻研究而興起的專門學問如何冠名呢？或曰黑水城文獻的學科定名如何解決呢？筆者以為應該仿效敦煌學，定名為“黑水城文獻學”，或者乾脆簡稱為“黑城學”。我們知道，學者們常將黑水城文獻與殷墟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文書並稱為 20 世紀初的重大考古新發現。實質上，以上新發現的四大考古新材料就文獻的文字種類和時代構成而言，殷墟甲骨文與居延漢簡很類似，黑水城文獻則與敦煌文書很類似。殷墟甲骨文是殷商時期的占卜檔案遺存，居延漢簡是漢代邊關軍民的實用簡冊遺存，二者均為單一文字單一王朝文獻。敦煌文書是以漢文為主而包括其他多種文字，時代構成是以唐代文獻為主而包括其他諸朝文獻；黑水城文獻則是以西夏文為主而包括其他多種文字，時代構成是以西夏文獻為主而包括其他諸朝文獻。因此，黑水城文獻的學科名稱應該仿效包容多種文字多個朝代的“敦煌學”一語而冠名“黑城學”，不應仿效只反映單一



文字單個朝代的“殷墟甲骨學”、“漢簡學”等語而冠名“西夏學”。一句話，“黑水城文獻學”或曰“黑城學”是準確反映黑水城文獻學術研究性質、完全涵蓋黑水城文獻文字種類、時代構成而又名實相符的最佳學科名稱。

最後還需說明一下“黑城學”與“西夏學”的關係問題。我們不主張以“西夏學”來指稱或代稱黑水城文獻研究的學科，但並不反對使用“西夏學”一語，而應明確“黑城學”與“西夏學”各自所對應的研究對象和學科範圍：“黑城學”所對應的研究對象應是所有黑水城出土的文獻材料（包括唐、五代、遼、宋、夏、金、偽齊、元、北元等所有文字所有文獻），所有圍繞黑水城文獻研究涉及的論題均應屬於這一學科範圍；“西夏學”所對應的研究對象應是所有西夏文文獻以及所有與西夏王朝有關的材料，所有圍繞西夏文、西夏王朝涉及的論題均應屬於這一學科範圍。因為黑水城文獻既以西夏文西夏王朝文獻為大宗，又有相當比例的非西夏文非西夏王朝文獻，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黑城學”與“西夏學”既存在大量的交叉滲透，也存在不少方面的壁壘分明。例如西夏文的《文海寶韻》，它既屬於西夏學研究的範疇，但同時也屬於黑城學研究的範疇，這足以體現“黑城學”與“西夏學”兩個學科的交叉與滲透。但是《文海寶韻》背面的漢文文書《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它就只能屬於黑城學研究的範疇，而無法歸入“西夏學”的研究範疇，因為它既非西夏文也非西夏王朝的文獻。如果說西夏曾經與兩宋王朝並存將近 200 年，勉強將宋代文獻研究也納入西夏學的研究範疇，那麼無論如何也不能將黑水城所出與西夏毫無關係的唐、五代、元朝（包括北元）等文獻的研究也納入西夏學的研究範疇。再如對西夏文涼州感通塔碑、賀蘭山下西夏王陵等的研究，它可以歸類為西夏學的研究範疇，卻無法作為黑城學的研究範疇。這無疑體現的是“黑城學”與“西夏學”的壁壘分明。總之，“黑城學”與“西夏學”既有相互聯繫交叉滲透的一面，也有相互區別壁壘分明的一面，二者既不是包含關係，也不是簡單的並列關係，而是有復雜交叉的並列關係，必須視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

（原刊於《河北學刊》2007 年第 4 期，發表時標題為《黑城學：一個更為貼切的學科定名》，並有刪節，今恢復全文）